

基于比较视角的我国古代历史哲学特征刍议

郑美珍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太仓 215300)

摘要: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十分丰富,也很先进。与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客观性上,早熟于西方历史哲学;在逻辑起点上,占领历史哲学最高法则制高点;在主体论与认识论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将两者融为一体,区别于西方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分裂;在指导作用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实践性贯穿始终。这些特征恰恰说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在17世纪前从未落后于西方,甚至走在世界前列。

关键词:比较视角;历史哲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21)1-0028-04

0 引言

无论是哲学走进历史,还是历史走进哲学,历史哲学都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巨大进步。学界普遍认为,历史哲学含义有二^[1]:其一,在广义上,它是哲学思维的一个特殊领域,是以人类社会的历史为对象的哲学思维,即哲学思想;其二,在狭义上,它是近代西方出现的一个以历史演变规律和历史理解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在西方,历史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在我国古代,历史哲学却是早熟的古老思想。我国历史与哲学本来就密切关联,历史典籍中不可避免地带着原生的历史观。漫长悠远的中国历史中有待深入探讨和系统化的思维问题不胜枚举,带着问题看历史,并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去解决,这就是哲学思想。可以说,在17世纪前,中国历史哲学从未落后于西方,甚至走在世界前列。因此,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特征对研究我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走向和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借鉴意义。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独立的历史哲学学科,但有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思想,与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特征十分明显。

1 在客观性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早熟于西方

每个民族或国家,出于天性,对人类社会、对历史演进都会关注并给予哲学思考,但民族性格各异,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一哲学问题,是大为不同的。西方民族虽有历史意识,但传统史学一直落后于中国。从思考的角度来说,从古希腊开始,最先感兴趣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世纪或许因为思考人的起源问题又关注人与上帝的关系,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历史哲学思想就飘着神的味道。中华民族则不同,从一开始就对人的起源追根究底,对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缅怀不已,对王朝的盛衰成败和社会的演进一直在反思追问。《诗经》曰:“绵绵瓜瓞,民之出生,自土沮漆。”^{[2]5-6}这说明了周族的发祥地在沮水和漆水的那边,也表达了子孙绵延昌盛的美好愿望。由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早熟,中国古人在追寻人的起源和发祥时,已经把上帝和诸神隐退了。古代中国将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如此大气的时空观里,隐退上帝和诸神之后,必定要有至高无上的法则来洞察万物之本原,这个本原是老子的“道”,是王夫之的“气”等,但终究不是神意的计划或上帝的安排,而是不外乎人的客观存在。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在深究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上也同样具有客观性。秦汉时期,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统一为哲学思想进步准备了条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把古代历史哲学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其编写的《史记》,贯穿的核心思想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23},即历史哲学思想。“究天人之际”

收稿日期:2020-03-07

基金项目:2019年苏州市科协软科学课题(C-10);太仓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TC2019PKX02)

作者简介:郑美珍(1975—),女,福建周宁人,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是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的内核,意思是天、人之间有界限,人类活动不受天命的制约,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了历史。“通古今之变”就是探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尽管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是为了给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服务,但必须肯定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与真实社会的逻辑性关系也就是客观性的意义。“成一家之言”,即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体例,表现了司马迁卓越的史学意识和历史担当。

明末清初,王夫之对史学、诗歌、理学和经学等都颇有研究,其历史哲学思想有集大成之成就。王夫之在其他领域的卓越成就恰是因为有了哲学思想为指导,而其哲学之所以能集大成,又与其唯物主义史观和辩证法的思维密不可分,进而把中国历史哲学的客观性推到新的高度。在万物之本原上,王夫之认为,宇宙充满着“气”,“气”是运动的,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并且认为“理”只是气的一种属性,即“理”在“气”中。有了唯物主义的史观和辩证法两大武器,王夫之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分析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清代章学诚在司马迁史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史学的客观意识,其《文史通义》开创了“纪事本末体”。纪传体是编写历史的一种好方法,但这种方法比较适合记载单个人的事迹或单纯的事件。如果参与的不止一人,而且时间跨度不止一年,用纪传体就会非常烦琐,而用编年体又会无所适从很难下笔,就算写出来,理解起来也会非常费劲。如果用纪事本末体把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写下来,就能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章学诚还强调写史要有“史德”,“史德”要与“史才、史学、史识”相结合^[39],要求写史者如实写史,不能随意添加自己的偏见;要有文采,写一手好文章。这就解决了历史真实问题,关于史学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冲突问题,这样的问题,在西方历史哲学中,都没有真正面对过,更谈不上好好解决。

2 在逻辑起点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占领最高法则制高点

历史哲学思想总有逻辑的起点或最高法则,唯有如此才能构建哲学理论体系。由于“历史”在含义上有“历史本身”(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认识论)的区别,故历史哲学也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双重任务,前者回答“历史本身何以可能”,后者回答“历史知识何以可能”。历史哲学围绕这两大问题,寻找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与规律,历史研究的方法、性质和价值等,进而做出了系统性回答。从17世纪开始,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域来看,西方历史哲学沿着本体论的古典思辨的历史哲学,到认识论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再到本体论的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路径演进。

从伏尔泰到孔德,从维柯到黑格尔,都是本体论的古典思辨的历史哲学。古典思辨的历史哲学所谓的最高法则是一种理论的假设或主观设定,把物的某些法则硬塞给历史,把自然本体当作社会历史的本体,是一种先验或超验的本体。这种本体存在,在伏尔泰那里是某种历史思维的类型;在维柯那里尽管摒弃了神的干预而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也排除不了天神意旨的安排;在康德那里是“自然意图”;在费希特那里是“世界计划”;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这种历史哲学的本体论思维虽然有很强的逻辑感或者说理论系统性,也包含很高的智慧,但这些本体存在都是先验的或者超验的,与真实的社会历史之间没有逻辑必然性,故在逻辑起点上就稍逊一筹。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是以“道”为本体本原。中国先哲自古代就发现物转星移、寒来暑往,认为万物来源于一个中心或本原——“道”。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哲们对“道”的表达不同。《尚书·洪范》中的箕子教周武王治国安民,要“会其有极,归其有极”^[28-29]。“极”原指房屋建筑最高处的大梁,大而中正,而箕子说的“极”,就是不偏不倚的“道”。《老子》认为,“天下一切生命都有自己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一切生命的根基”^[40],这个根基就是“道”,在这里,“道”是生命的源泉,是万物的本原。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这里“大道”即是万物本原,更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最高法则。每一个民族的哲学思维的发展都离不开形而上学,中国传统哲学与历史哲学从未离开“道”。后期,宋儒所说的“理”,王夫之所说的“气”,都没有跳出“道”的本原范畴。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以“道”为本体本原,以“道”为逻辑起点,克服了后起的西方哲学先验或超验的本体,与人类真实的社会历史之间存在逻辑关系,从而在逻辑起点上占领历史哲学最高法则制高点。

3 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将两者融为一体

18世纪之后,西方哲学家相继严肃提出两大哲学问题,即“历史本身何以可能”和“历史知识何以可能”,并分别给予哲学思考与哲学回答,形成了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本体论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和认识论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

从维科到黑格尔,围绕“历史何以可能”的问题,思辨历史哲学家构建一个又一个系统化的哲学体系。1725年,维科在其历史哲学巨著《新科学》中指出,以往哲学“对历史不敢问津,从而错过了唯一可以真正认识的对象”^[136]。维科对历史进行哲学思维后有了重大发现——人创造历史,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甚至观念的历史如史诗、神话也是人创造的产物。因此,历史哲学的诞生,源于对“上帝造人”的反思批判。而费希特的“世界计划”,则是康德“自然意图”的继续。费希特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理性与自由的历史,从而比纯理性的先验哲学多了更多的历史注脚。康德和费希特的先验历史观在黑格尔那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的著名论断,认为理性统治着世界也统治着历史,世界历史就是理性的展开。

19世纪末,以布拉德雷提出“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为标志,西方历史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即批判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建立的哲学体系无疑是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对立和严重的冲击。德罗伊森认为,历史事件不能直接成为历史的对象,因为它是过去的东西,只有被意识到的事件,才能被历史学家感受、还原,从而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德罗伊森的思想得到狄尔泰的批判继承,进而发展为“精神科学”。其后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家或强调历史无规律性,或强调历史知识、历史对象的特殊性,或就历史学家怎样认识历史进行研究。比如,克罗齐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目标不是一般概念,而是以直觉的方式再现特殊,因而是艺术的一部分,哲学与历史是同一个东西,哲学是精神哲学,精神的表现过程就是历史。在克罗齐这一命题的影响下,科林伍德进一步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为历史学家是从他自己的思想出发重演过去的思想并认识历史。西方历史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存在退隐,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登场”^[128-30],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

20世纪伊始,在反对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过程中,西方历史哲学又向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变。与18世纪古典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人的自由的探索不同,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坚持以作为整体的历史本身为研究对象,即“历史本身何以可能”。在全球视野里,历史哲学家们以文化的兴衰取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历史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比如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和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即使如此,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依然没有解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对立问题。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18世纪西方历史哲学诞生以来,历史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一直是对立和分裂的,或对“历史何以可能”给予回答,或对“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给予回答,非此即彼,这种明显的分界造成形上与形下的割裂。批判历史哲学家反对思辨历史哲学家先验或超验解释历史过程,然而当他们以自己的心灵或心里感知、经验或者判断去选择历史事实的时候,是不是对待历史知识太过于随意?西方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看似格格不入,对立批判,以语言逻辑对待历史哲学命题,分析来分析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一切的历史的真理、价值或者精神都不复存在,哲学陷入无本原、无最高原则的空虚之中。

但是,中国历史哲学从古代开始就以“道”为本原,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不仅可左右还可上下,可生可化。中国历史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是融为一体的。“中国哲学中的一阴一阳之道,向上可以提升为阴阳两仪的纯法则,提升为纯、粹、精和宏、光、大的存在,而及其往下落实,则又周流宇宙、贯通万物,无处不是阴阳之道、无处不是阴阳化育之理。故中国哲学不仅讲道体、道相,更讲道用、道征。”^[116]中国历史哲学不仅望星空,还接地气,不仅探索历史的源头和本原,还以此分析历史盛衰成败,形上形下浑然一体,天道与人心、天理与人欲不是分裂隔离的,道不离事,事不离道,从而实现历史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

具体到老子的哲学思想,它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并回答“历史何以可能”和“历史知识何以可能”,但深含对这两大问题的解答和哲学智慧,并且实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在统一。《老子》认为,“天下一切生命都有自己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一切生命的根基。一旦掌握了万物的根基——母,就能认识世界的万事万物——子。即使已经认识了万事万物,已经把握了一切生命,还必须坚守着生命的根基——道”^[147]。生命的源头恰是历史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或历史的源头就是“母”;如何认识世界、认识历史,只要先掌握万物的根基——“母”,就能认识世界的万事万物——“子”,同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还要遵守内在的规律“道”。但“道”不是感性地存在,无形无声无名,甚至无以言表,所以“道”需要更生动更感性地表现,这就是“德”。

4 在指导作用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实践性贯穿始终

前文所提的“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是箕子对周武王如何治国安民的劝告,但这不是一般的劝告,而是

提出了一条历史哲学的根本法则——一切政治活动及社会历史行为都不能偏离“极”,也就是“道”。《论语·泰伯》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2]在遥远的唐虞时代,尽管人们的思想高度有限,“无能名焉”,即不能明确提出抽象的概念范畴,但一切政治活动及社会历史行为都不能离开“道”的历史哲学法则或历史经验,并被代代相传下来,在治国安民中起着实践指导的作用。

明末清初,王夫之力图分析天下兴亡、王朝更替的原因及其内在的规律,并给予系统化概括,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其所著《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对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分析与真实历史之间都有较强的逻辑性。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思想带着浓厚的历史使命感和实践性,促使他不仅反思明朝因何而灭亡,更是要深刻总结中华民族几千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并论证先进民族不可被灭亡的必然性。他进一步认为,这样的总结和论证必须具有高度的严肃性,才能鉴别、通广、资深,也才能成为爱国复国实践活动的指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并非随意向任何方向演进,而是遵循人类历史规律并沿着他们的文化来演进,而其中历史哲学思想所提供的哲学智慧、价值取向起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中国历史哲学思想是深得人心、富有实践性的,对如何治国安民、如何创业守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这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如此,对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治国理政也同样有借鉴意义。

5 结束语

17世纪前,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十分丰富,从未落后于西方。与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客观性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不仅在万物之本原上早熟,隐退了上帝和诸神,在深究人类历史演进的规律上,也同样具有客观性,早熟于西方历史哲学;在逻辑起点上,以“道”为本体本原占领了历史哲学最高法则制高点,能更好地构建哲学理论体系;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我国历史哲学从古代开始就以“道”为本原,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不仅可左右还可上下,可生可化,使本体论与认识论融为一体,区别于西方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分裂;在指导作用上,中国历史哲学的实践性贯穿始终,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有实践指导意义,对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治国理政也同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张志伟,冯俊,李秋零,等.西方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2]司马云杰.盛衰论——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 [3]庄国雄,马拥军,孙承叔.历史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4]戴建业.老子自然人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 [5]陈赞,从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到文明论的历史哲学[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8):28-30.

(责任编辑:范可旭)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sophy Based 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ZHENG Mei-zhen

(School of Marxism, Suzhou Chien-Shi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aicang 215300,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sophy is significantly rich and advanced. Compared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sophy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objectivity, it matures earlier than western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terms of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t occupies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highest law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terms of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tegrates the two,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split between the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in terms of guiding role, the practicality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ical philosophy runs through. These characteristics precisely show that the Chinese ancient historical philosophy never lags behind the western one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even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istorical philosophy; characteristics